

# 如何理解中国的崛起及其意义<sup>[1]</sup>

■ 张蕴岭 / 文

## 引言

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崛起，外界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成为 21 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并将会改变世界原有的权力格局平衡。自从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得到显著的增长，尤其是 2000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尤为引人注目。仅仅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至第二位，贸易增加了 3 倍，从 2004 年的 1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11 年的近 3 万亿美元。<sup>[2]</sup> 据估计，如果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 2030 年或更早些时候超越美国升至世界第一位。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过去 30 年，经济年平均增长 10%，其快速崛起对地区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世界都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与一个陌生的和快速发展的中国打交道。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威胁，因为它将改变甚至终结已经由西方世界主导了两个世纪的现存体系和秩序。另有一些人则对中国会影响区域秩序和周边关系而感到忧虑，因为中国具有这样做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其实，既然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体系，对世界而言，至关

重要的是接纳和适应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并且鼓励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良性互动。

尽管中国将会继续其崛起进程，但同时它也要应对许多挑战，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中国将会继续拥有许多优势，比如，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它仍拥有巨大的潜力，社会和政治环境会继续保持稳定，改革开放的政策将会坚持下去。然而，中国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比如，正在改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再平衡的压力，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推动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推进政治改革进程等等。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需要更加重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与外界的关系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承诺和平崛起，世界也应把中国的崛起视为积极的发展。

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并非是单个事件，一组新兴经济体正在同时崛起。在亚洲，印度和东盟成员国也正在崛起中，新兴经济体将成为最具活力的增长引擎，到 2030 年，它们将是最大的经济体。

面对新的变化，许多新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应当受到关注的是权力转移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如何规划未来。

本文旨在从区域和全球视角检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重点关注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时，中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

## 认识中国的崛起

自从中国实行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世界 GDP 中所占的比重从 1991 年的近 4.2% 增长至 2010 年的 13.6%（按购买力平价）。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平均高达 10.5%（如图 1）。中国经济的增长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其 GDP 的总量在 2005 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在 2007 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 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就总量而言，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大的制造商和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者。显然，正如评论所指出的，“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造成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再分配”。<sup>[3]</sup>

用对外贸易衡量，中国的崛起更加引人注目。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从 1991 年的不足 1400 亿美元增加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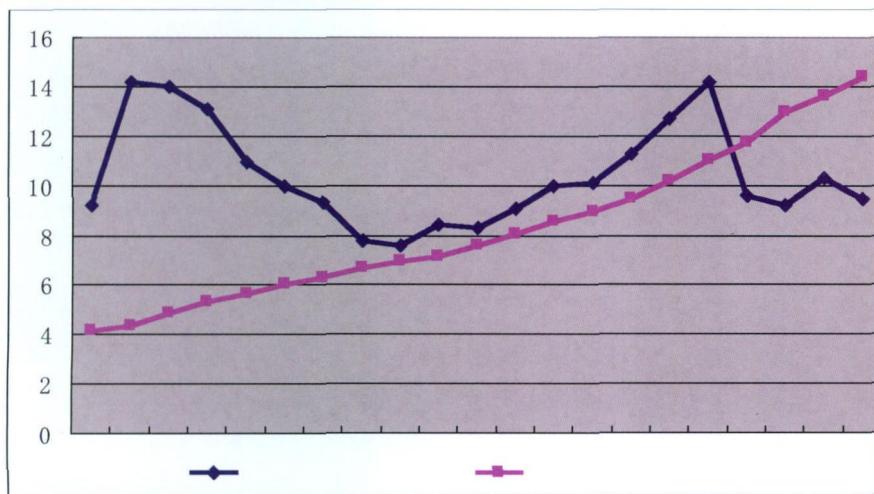


图1：中国经济增长率及其GDP所占世界比重（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

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世界经济展望评估。<sup>[4]</sup>

2011年的超过3万亿美元，在2002年排名世界第五，2004年排名世界第三，2007年排名世界第二，2008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占世界的比例从4.3%上升至10.4%。

中国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1991年外汇储备额为2710亿美元，2011年已升至3万亿美元，较1991年增加了1230倍。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得益于其改革开放政策，改革的方向是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开放则是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加速，因为其经济体制必须与国际规则及标准接轨。全球化为中国开拓世界市场并发挥自身优势提供了机遇，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也有助于中国加快其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推进利于参与市场竞争的对外开放。

不同于日本及韩国的是，中国采取了欢迎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外来投资对中国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和提高管理能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投入到内地南方沿海省份的香港

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建立现代工业和学习先进商业管理经验的先行资本。中国南方从利用国际直接投资中实现经济繁荣的经验使政策决策者有信心来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区域和全球的生产网络。由于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等特殊优势，中国成为地区和全球大公司进行重新分工或者进行商业网络扩张的一个主要市场。截至2010年，外资在中国投资的总量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使中国成为加工装配产品的“世界工厂”和为全球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主要供应市场。

出口成为激发中国经济活力的最主要因素。通过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中国的出口行业迅速对自己的技术和管理进行提升，这也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总体水平。事实证明，中国在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方面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竞争，也得益于政府对引入新技术所采取的积极政策。<sup>[5]</sup>

中国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

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按新增GDP计算，中国在2006年超过了美国，在2009年超过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sup>[6]</sup>

中国经济的成功当然归功于自身的改革开放政策，但全球化、或者说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体系，的确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使其将潜力变为现实。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显著地位，这有助于其实现快速增长和创造巨大的就业机会（这是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关键因素）。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总量和方式，其融入全球市场对于重塑全球市场结构意义非凡。例如，中国的廉价商品有助于降低日常消费品的价格，而因需求不断增长，中国则加大了能源及原材料的进口，从而拉高了这些产品的价格水平。英国经济学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曾经说过，全世界都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冲击：对于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原材料生产商而言，这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商品以更高的价格出口，并能够进口到廉价的制成品，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对西方和日本而言，意味着消费品和服装价格的大幅降低，进而促使商品价格的不断下降；对东亚其他经济体来说，这意味着可供其商品投放的巨大新兴市场，还有可供消费的廉价中国商品。不管具体的影响如何，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都是有益的。<sup>[7]</sup>

中国的崛起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巨大关注，然而，对中国的看法却观点各异，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等等不一而足。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循世界大势而已，也有人认为，中

国成功的关键不过是转向市场体系。<sup>[8]</sup>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的认识有很大的争议？看来，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太快了（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面临如此多的挑战必须加以应对（对中国应对的能力信心不足）。中国面临的挑战甚多，尽管对中国长远发展做出具体预测并不容易，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会继续其崛起之路，到2030年，甚至可能早于彼时，将成为全球GDP总量最大的经济体。据此，有人认为，“这代表着正在进行（非政治意义上）从西方到东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权力转移”。<sup>[9]</sup>

当然，我们不应把中国的持续崛起视为理所当然，中国必须能成功地应对挑战。挑战之一就是，中国能否顺利构建一种新的、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以及具有社会和政治可信度的发展模式。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表明，中国下决心迎接这些挑战，并努力向新的发展模式转变，即从出口导向型的高增长模式向国内消费导向模式的转变，从低效的赶超模式转向创新（技术和管理）与高效的模式转变，从高速增长为导向的战略向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模式转变。显然，中国将借此将其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关注生活质量，增加社会财富，扩大社会公正，对所有人都机会均等的新模式。<sup>[10]</sup>

目前，尽管中国已成为GDP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但中国的人均GDP仍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考虑到庞大的人口，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仍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从长远来看，中国将会有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例如，如何通

过把中国从世界装配中心转变为世界创新中心来纠正贸易失衡，而同时又能为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创造必要的工作机会；如何迎接“提早老龄化社会”所引起挑战，而同时又能继续保持经济的活力；如何推进政治改革，建立一个可信度高的制度，而同时又能确保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需的稳定社会环境；如何处理好与邻国、特别是与现有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而同时又能兼顾中国自身日益增长的权力与利益。<sup>[11]</sup>

中国的崛起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其经济的规模，还因为其独特的政治制度，即中国所坚持实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现有的西方主导模式。在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北京共识”或者说“中国模式”得到世界的更多关注。<sup>[12]</sup>不过，尽管中国一直致力于和平发展，宣示要构建和谐世界，但仍不能阻止一些人另生他念：中国的崛起方式是否意味着西方主导体系的终结？中国是否会利用其正在增加的权力和影响力，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改变现有的全球体系？<sup>[13]</sup>

### 中国崛起的区域含义

事实上，中国的崛起与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同时出现。在亚洲，印度作为世界第二大人口国，实行改革与开放政策，被认为是紧随中国之后另一个崛起的大国。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随着几个具有潜力的新经济体（如印尼）出现，其上升趋势将会持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东亚经济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经济，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其结果是，东

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获得极大提升，这个趋势还会持续。预计，中国的GDP占全球比重将在2030年达到20%，而印度达到10%，东盟为5%，这样，届时，三者GDP之和将占到全球GDP总量的三分之一。<sup>[14]</sup>

这样的发展意义重大，意味着主

	2020	2030
全球产量 (市场汇率，美元\$万亿)	90	132
亚洲占全球比重	33.5%	38.9%
全球经济增长 (表内所列年份的前十年)	4.0%	3.9%
亚洲经济增长	5.8%	5.2%
亚洲占全球增长份额	55.7%	59.3%
全球人均GDP (按购买力平价)	14300	19400
亚洲人均GDP (按购买力平价)	10600	16500

表1 2030 亚洲经济占世界比重

注释：亚洲包括49个经济体（此处略）

Source: ADB report: 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 2011.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实现亚洲世纪》，2011。

要新兴经济体将会成为最具活力的全球经济引擎，<sup>[15]</sup>结果是，不但新兴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会明显提高，而且世界市场的结构也会重塑，因为最具活力的需求将来自新兴经济体，而不是来自发达国家。<sup>[16]</sup>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东亚经济增长一直受益于两个重要的发展，一是融入全球多边体系，二是亚太地区的区域生产网络（尤其是在东亚）。由于美国市场开放，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对其生产和销售在该地区的再分工，亚太地区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格局，即美国作为终端消费市场，东亚作为终端产品的生产商。在这个分工格局中，美国公司将大部分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



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东盟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已经成为所有东亚经济体的主要市场。  
图为第20届东盟峰会在柬埔寨金边开幕。

型工业）由美国转移到东亚，而满足这些消费品的需求，则需要依赖外部供给，尤其有赖于东亚地区。在东亚，生产网络逐渐从日本扩延至“四小龙”，再到东盟和中国。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动基于从高收入经济体到低收入经济体的合理竞争。这种分工平衡维持了几十年，造就了太平洋两边的密切经济联系。然而，这种平衡似乎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到这个生产网络之中而被打破，因为中国拥有丰足的廉价劳动力、广阔的市场前景，独特稳定的市场环境，超强的学习能力，优势显著。这样，中国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生产装配和再出口中心，其结果，中美之间的贸易出现巨大的不平衡，美国的贸易赤字剧增，而中国的贸易盈余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当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时，中美之间实现再平衡的压力就凸显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平衡，即美国不再是东亚日益增加的出口商品的主要消费市场，而东亚经济发展的

动力也将不再主要依赖出口部门的扩张。为了重新获得活力、东亚经济体必须进行大的改革，比如，亚洲大约50%的出口是面向本地区之外的，但由于亚洲内部主要从事的是半成品贸易，超过一半的半成品在成为外部市场的消费品之前都是在东亚进行组装，因此70%以上的最终产品需求来自于外部经济体。<sup>[17]</sup>很显然，在外部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东亚经济体需要通过实施新战略和新政策来刺激国内和本地区的消费需求。这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应推行一种包容性的崭新发展战略，减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通过倡导“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推进城市化、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网，使国内的消费水平，即内需提升，从而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情况大大减轻；

——要寻找一种与东亚新兴经济体以往所遵循的传统工业模式相异

的新发展方式。事实已经表明，单纯的“赶超战略”已经遇到资源、能源、环境及外部市场的瓶颈。这种状况日益严重，难以持续，意味着人们必须改变旧的生活方式，转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sup>[18]</sup>

但是，转向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放弃比较优势，完全不再发展出口部门。事实上，全球危机所暴露的问题并非开放经济的危险性，而是忽视内需潜力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能够克服妨碍内需增长和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增长的结构性问题，就能为东亚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力。反过来，强劲的国内经济增长也会创造更富活力的对外贸易联系，从而可使经济获得多元的增长源泉。这样，基于地区与全球生产的合理分工，东亚可以继续为世界市场提供价廉和高质的产品和服务。但是，东亚必须在发展“轻型经济结构”上花更多的心思，包括更为重视服务部门的发展、提高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sup>[19]</sup>

美国也必须做出改变，它必须通过采取更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降低其贸易赤字，同时应该保持市场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表明，美国必须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实现自身内部的平衡。<sup>[20]</sup>

亚太经济再平衡和结构调整的另一个问题是区域机构的角色。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一个拥有 21 个经济体，以促进经济一体化和合作为重要的区域机构，它设定了茂物目标，推动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成员分别在 2010 年和 2020 年前消除贸易与投资障碍。但是，“协调的单边开放”原则在落实目标上显得软弱无力，使目标难以实现，到了 2010 年，发达国家并没有落实承诺。<sup>[21]</sup> 美国于 2006 年提出了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议，但没有得到 APEC 成员的积极反应。

APEC 框架下的区域自由化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多层次的地区贸易协定却发展迅速。美国在亚太地区签署了多个地区自贸协定，1989 年与加拿大订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1994 年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了三边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后来又先后与智利、新加坡、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韩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2010 年，美国宣布领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又迈出了新的一步。TPP 有九个初始成员，目的是签署一个面向新世纪的高标准自贸协定。与传统的自贸协定相比，TPP 覆盖了更多的议题，既包括贸易、投资和服务等传统议题，也包括知识产权、劳动力、国有企业等所谓“边界内的”新议题。<sup>[22]</sup> 中国已经

是所有亚太经济体的重要贸易伙伴，但并没有参加 TPP 的最初谈判。

在东亚，东盟于 1992 年率先建立了自贸区（AFTA），后来它又达成了多个双边和“东盟 +1”自贸协定。东亚自贸区的发展受到多个因素的推动，如东盟作为开拓者所起的作用，还有多边议程（世贸组织多哈发展议程）进展缓慢，以及 1997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等。显然，这些因素使东亚各经济体明白，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必须建立他们自己的自贸区，因为不这样做在全球竞争和多边谈判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sup>[23]</sup> 1997 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东亚走向区域化，各经济体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有助于催生一种区域经济的认同感。

相互重叠的自贸协定带来了“意大利面碗”效应，<sup>[24]</sup> 为了克服这方面的问题，东亚一直做出努力，力求建立一个涵盖整个地区的自贸协定，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基于东盟 10+3（中国、日本、韩国）或东盟 10+6（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地区自贸协定，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正在试图建立一个三边自贸区，这方面的谈判可能会在 2012 年有所进展，不过，三国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封闭的经济集团，而是旨在为建立更大范围的东亚自贸区提供助力。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居关键地位，在参与和推动东亚自贸区方面非常积极，发起了中国—东盟自贸区、主导了东亚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积极推动中国—日本—韩国自贸协定等等。东盟是建立区域自贸区的先行者，已经与其他亚洲经济体谈判达成多个“10+1”自贸协定，其主要的努力首先是自身的共同体建设（到 2015 年

建成东盟共同体）。东盟所面临的挑战是，能否积极推动建设一个更广泛、更统一的东亚自贸区。在中日韩三方谈判自贸区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东盟似乎也感受到了压力，因此，在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自贸区框架（基于东盟 10+3，或东盟 10+6）方面，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势。

印度通过实施东向战略与东亚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分别与东盟、韩国签订了自贸协定，与日本签订了紧密伙伴关系协定（CEP）。显然，印度作为东亚峰会（EAS）的成员，会从建立一个广泛而统一的东亚市场中得到好处。尽管印度经济崛起较晚，在自身市场开放方面较为保守，但随着其自身力量增强与能力提高，在参与和发展东亚自贸区方面将可能会表现得更加积极。

未来，中国、东盟和印度可能被整合进一个单一的亚洲地区贸易框架之中。鉴于深度的地区一体化将有利于区域内的贸易发展，东亚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将有利于消除东亚与外部的贸易不平衡。中国已经成为所有东亚经济体的主要市场，在调整地区生产网络结构方面，将扮演关键的角色。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如果亚洲经济的一体化可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和其他经济体所生产的产品最终就可以主要由本地，而非外部市场来消费。

如何在中国不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美国不参与东亚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下整合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这仍然是一个问题。从未来趋势看，一种可能是，通过亚太自贸协定（FTAAP）的谈判来把这两个地区贸易框架（TPP, EAFTA）整合成一个单一的地区协定。<sup>[25]</sup>

## 中国崛起的全球含义

中国未来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开放的国内和全球体系。为了推动国内的调整与改革，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将坚持开放政策，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和融入全球及地区体系。中国的未来发展依赖于一个开放的全球体系，因为只有全球体系才能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能源和市场。中国之所以必须继续实行开放政策，是因为只有进行公开竞争，才能使其更具竞争力和效率。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在进一步推动全球和区域自由化和一体化中扮演积极的角色。<sup>[26]</sup>

如果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能够自我调整并继续保持开放政策，全球经济的发展将变得更加平衡和可持续。当然，这也要求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花大力气调整并改变它们的政策，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有的问题，单方面努力无效。美国必须扭转国内的低储蓄和高赤字（公共支出和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欧盟必须制定更加严格的财政规则，解决沉重的债务问题和保持欧元的稳定，迫使债务危机成员国解决它们的问题。在全球层面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一些新建机制，比如二十国集团（G20），应该在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重振多边进程（通过设立新的多哈议程）中发挥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维持市场开放和一个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上有着重要的利益，将积极支持多边主义，其经济的成功有赖于对全球市场的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是建立在高度开放的结构基础上的，即是与全球市场体系

融为一体的，因此，东亚地区主义并非是对多边主义的一种替代。

通过融入全球体系，新兴经济体不仅受惠于加工出口的自由化，也受益于各国机制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提高。中国从加入WTO中收益良多，无论是在贸易方面，还是在资本与资源方面，都高度依赖于一个开放的全球体系，因此，将会继续积极参与和支持多边体系。

全球经济的比重将进一步向亚洲转移，因此，中国、印度和东盟都将成为全球体系的更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它们将在全球治理和决策制定中扮演更加积极和更加重要的角色，这包括建立开放的贸易体系、稳定的财政体系、公平的国际法律和规则、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处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等。为了在全球规则制定和执行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需要对国际机构给予更多的投入。不过，在全球治理中强化自身的角色也将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国内制约因素将限制其在重要的国际机构中扮演领导者角色的能力，还会限制其在制定新规则中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sup>[27]</sup>随着经济和社会快速的发展变化，中国的经济能力、政治公信力及社会共识也都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中国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应对来自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再分配之间的不平衡，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和建立可靠的社会保障网之间的不平衡，以及高

度依赖外部资源和确保供应安全之间的不平衡等诸多的挑战。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称中国是一个“外强内弱”的大国。原因是，尽管经济规模不断增大，实际上许多方面中国都还很脆弱。<sup>[28]</sup>

如果把亚洲新兴经济体视为一个

群体，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政策优先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它们似乎很难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形成统一的立场。因此，亚洲新兴经济体要想扮演出色的角色，会面临很多限制。从国内层次上看，挑战之一就是，它们能否在崛起的道路上成功克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例如，中国将失去低成本优势，而不得不建立新的稳定结构来保证经济发展，新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具备新型创新能力来保持竞争力。在重建过程中，亚洲新兴经济体可能不愿意快速和更广泛地推进经济自由化。对印度而言，其国外贸易份额在GDP中所占比重很小，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低，因此，通常对待市场自由化的政策非常谨慎。尽管印度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全球和地区体系，并在自贸协定谈判中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自由化政策，但考虑到其在成为经济大国道路上实现社会—经济平衡方面的脆弱性，它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推进经济自由化和获得社会的支持，否则，国内将滋生社会不满和反全球化情绪，这会阻止印度在全球开放与治理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国际金融危机表明，现行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在应对新危机和管理新的市场问题方面缺乏效力，为此，在改革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其中的表决权和关键职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个开放的全球体系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的强劲增长得益于有利的全球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对全球市场的不断融入，也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增长，使其他国家从中受益。<sup>[29]</sup>尽管中国不得不调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更加倚重于国内需求，但它对开放的全球体系的兴趣并不会因此减少，这是因为中国未来的经济活力将与全球贸易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便国内需求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之后，中国仍将会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贸易地位。除了参与全球贸易、财政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外，中国还将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不过，人们不应担心，中国一旦变成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将支持并且创建一个完全不同于现有体系的新全球体系。

就地区一体化与合作而言，中国支持的是一种开放与灵活的方式，以使其与开放的全球体系互补。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中国特别关注它与邻国的关系。中国将通过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来提高和加强与邻国全面关系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地区事务中要有更大的作为，在与邻国政治与安全关系中增大影响力，这都是其经济力量提升的自然反应，这与中国对多边体系的兴趣、介入和承诺增强并不矛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学部委员，教授)

(责任编辑：丁云)

[1] 本文为作者参加由亚行研究院与美国皮特逊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关于亚洲崛起的国际研讨会提供的论文。原文为英文，由徐海娜博士译成中文。

[2] 中国的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0.22万亿美元增加至2000年的1.2万亿美元，在18年中增加了5倍多，但是从2000年1.2万亿美元增加至2010年5.88万亿美元仅用了10年时间。

[3]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western world, Allen Lane, 2009,p.192.

[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September 2011.

[5] Dani Rodrik,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1947, January 2006; 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10, p.104–105.

[6] 卢峰. 测量中国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2,1:35.

[7]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western world, Allen Lane, 2009,p.319.

[8] Chen Zhiwu, "Understanding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160 years," *Capital Market*, 2008, no.3, p.33.Yao Yang, "Beijing Consensus or Washington Consensus: What Explains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Development Outreach*, April 2011, pp. 28–30.

[9] Daniel Burstein and Arne de Keijzer, *Big Dragon—China's future: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the economy and the global order*,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8, p.97.

[10] Zhang Yansheng, "China's New Growth Strategy," *SERI Quarterly*, April 2011, pp. 23– 31.

[11] Susan L.Shirk calls China "a fragile super power" and also "two faces of China's power because of all those challenges. See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 power*, Oxford, 2007.

[12] 关于“中国模式”的重要文集参见潘维. 中国模式：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13] 有些人认为核心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即中国是否承认国际组织的现有规则及规范的基本合法性，并且即使在承认之后是否会寻求大幅度改变之。参见 Ezra F. Vogel edited, *Living with China—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1997, P.131–132.

[14] 亚洲开发银行的另一个预测是，亚洲将占全球GDP总量的40%。ADB, *Asia 2050: 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1.

[15] 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的，六个新兴经济体：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和俄罗斯将共同包揽全球经济的一半增长。Justin Yifu Lin and Mansoor Dailami, "The Coming Multipolar World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ummer 2011, pp.30–31.

[16] World Bank, *Securing the present, Shaping the future*,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2011 Vol (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1.

[17] ADB,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0 update*,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0b.

[18] 亚洲开发银行(2011)指出，对于稀缺自然资源(能源、矿产、水和肥沃的土地)的竞争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凸显，随着30亿东亚人变得富有而恶化，如果东亚人想要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情况将会更糟。地球无法供应如此大规模的需求，尤其是那些不可再生的原材料。

[19] 这将给它们带来好处，即一种“更轻盈、更清洁、更绿色的增长模式”。参见 Stephen S. Roach, <http://media.blubrry.com/ps/media.libsyn.com/media/ps/roach2>

[20] 关于如何恢复美国经济平衡的观点非常不一致，有些人谴责中国“公然违背全球贸易规则，破坏美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参见 pat Choat, *Solving American's economic crisis*, Dec.12, 2011, <http://economuincrisis.org/content/solving>

[21] K. Kesavapany and Hank Lim, *APEC at 20*, ISEAS, 2010, Singapore, p.7, 61.

[22] 日本在2011年宣布加入TPP谈判磋商，有更多国家可能在今后加入。

[23] ADB, *Emerging Asian regionalism: A partnership for shared prosperity*,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8.

[24] 比喻相互交织的协定犹如缠在一起的一碗面条，让企业理不清楚，从而形成新的经营障碍。

[25] 有观点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将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多边化，因为地区贸易协定不会因多边主义带来的好处而自动失效。See Jiro Okamoto edited, *Whether Free Trade Agreements?*, IDE, JETRO, 2003, Tokyo, p.11

[26] 爱德华·斯坦菲尔德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当前的经济上升与一个国家以何种方式崛起并改写国际贸易规则无关。这不是一个关于落后的、处于政治外围的国家通过其自身优势，以全球代价获取自身发展的故事。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10, p.17–18.

[27] 有观点认为：“中国将由于其棘手国内问题的牵制而在几十年内都受到遏制。” Daniel Burstein and Arne de Keijzer, *Big Dragon—China's future: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the economy and the global order*,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8, p.27.

[28] Susan L. Shirk, *China—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9] World Bank, *Securing the present, Shaping the future*,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2011 Vol (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1.